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杨学诚：从清华学子到抗日先锋



杨学诚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他是清华学子，当民族危亡悬于一线时，他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他是抗日将领，当抗战形势焦灼、国土相繼沦陷时，他毅然奔赴鄂中农村，以“八条枪”为基础发展敌后游

击武装，屡挫日伪气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南麓，抗日英烈杨学诚长眠于此。“读书时就听闻老学长的故事，如今来到他的故乡工作，更能体会他那份抉择之重。”在黄陂参与基层工作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孙欣颀说。

杨学诚，191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研子岗一户贫苦农家。1934年，杨学诚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初入清华园，他寡言少语，安分内向，鲜少参加课外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的争夺。然而，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极力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刺痛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心。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杨学诚与数千学子一道，冲破军警封锁，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随后，他加入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宣传团，顶寒风、冒风沙，徒步乡野，将救亡火种撒向广阔农村。

民族危难之际，他完成了从“书生”到“战士”的蜕变。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集体讨论时，他从坐着说

到站起来说，再到边走边说，总能点燃大家的热情。”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回忆，多位曾与杨学诚共事的老同志都赞叹他擅长做思想动员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杨学诚9月初抵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工)委青委书记。同年12月，他创建和领导了湖北青年救国团。该组织如燎原星火一般发展至5万余人，成为武汉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国抗战烽火连天，日军进逼华中。1938年8月，组织一声令下，杨学诚奔赴鄂中，与同志并肩开创抗日根据地。在应城夏家庙，他们培训抗日骨干300余人，为鄂中敌后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組織基础。

应城告急前夕，他喊出“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的壮语，带领当地县委白手起家，在“八条枪”的基础上，创立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9年6月，“应抗”主力整编加入新四军，鄂中、豫南武装实现统一指挥。杨学诚历任多个指挥要职，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坚持进行敌后游击斗争。

“那时条件艰苦，二伯穿着生满

跳蚤的旧衣服，和战士们挤在一间土房里工作。”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讲述，1939年，祖母得知儿子在应城驻防，带着子女步行6天前去探望。部队首长见其家贫，悄悄塞给杨母两块银元。杨学诚得知后，恳请母亲退还：“现在队伍困难，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942年8月，杨学诚兼任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率部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途经家乡黄陂时，他动员青年参军。留宿家中当晚，母亲劝他早日娶妻，他却说：“全国尚未解放，我哪有心思成家？”并向家人许诺“等胜利了，一定接你们到武汉团聚”。然而，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和求学时染上的肺炎，拖垮了他的身体。1944年3月，杨学诚病逝于大悟山高家洼，年仅29岁。

抗战胜利后，英魂归葬故里。如今在黄陂，每逢清明、“七一”等节点，前往杨学诚陵园凭吊的群众络绎不绝。“时代不同，但报效国家的赤诚一脉相承。乡村振兴，基层就是前线，我会把这份志向融入人民子弟头，为乡亲们多做实事。”孙欣颀说。

(新华社武汉7月14日电)

抗日英烈蒋志英：铁血骁将誓守海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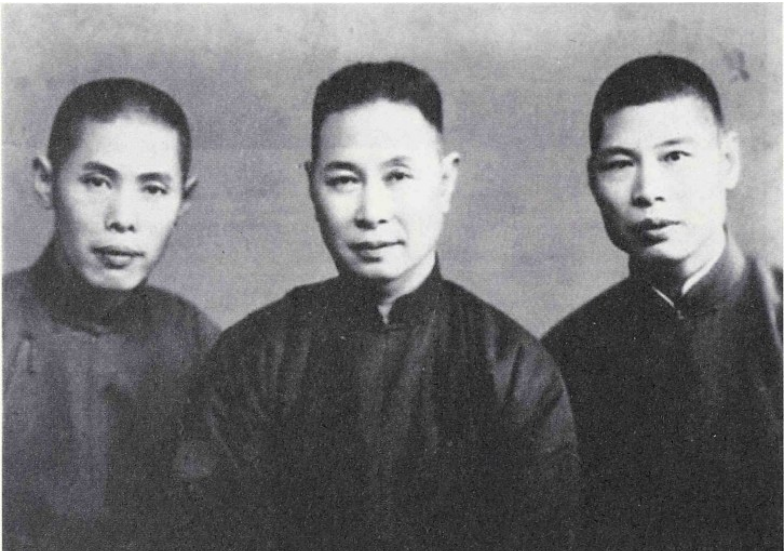
这是一条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街，一头连着城市，一头通向大海，老街上的石牌坊刻着“海门关”三个大字，见证着它在战争年代的重要位置。

“1941年4月，日军向海门发动进攻，当时驻浙东沿海台州守备指挥部的蒋志英将军，就在海门关附近的岬岙岭壮烈牺牲。”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方根法指向城南一处不高的丘陵。

蒋志英1902年出生于浙江诸暨湫浦镇盘山村。1925年11月，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一期。1926年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北伐军排长、连长、营长。1929年调至浙江省保安部队，历任营长、上校团长，省保安处副处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志英毅然投入抗战洪流，历任浙江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等职。

海门地处浙东沿海，自古就是军事要津。1940年，蒋志英奉命调任浙东沿海台州守备指挥部少将指挥官，驻防海门，负责温岭、临海一带的海防。

当时，守备部队多由地方自卫队员和水上警察组成，军事素质和纪律性较差。蒋志英到任后，严格执行部



蒋志英(右)与兄弟合影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队组织纪律，赏罚严明，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用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官兵，鼓励他们苦练军事技术、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死难同胞报仇。经过他的精心指导和训练，部队素质明显提高。

1941年，侵华日军为消灭浙东数万中国军队，从海上发动海陆空三军联合进攻。面对严峻形势，蒋志英临危不惧，组织守备部队严密布防、奋力抵抗。4月18日夜间，守军与偷渡登陆

的日本侵略军激烈战斗，炮声轰隆，弹如雨下，海门被火光映得亮如白昼。

坐镇指挥部的蒋志英没有丝毫迟疑，他一面命令警卫营严密警戒，一面电请增援，率参谋副官数人转战途中不幸遇敌，被日军用刺刀刺穿胸部，壮烈牺牲，时年39岁。

“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我们盘山籍的共有10多位，蒋志英就是其中优秀的一位。”今年55岁的蒋才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离开盘山村外出创业，心里始终记着从小耳濡目染的英雄故事，“每到过年回老家，和长辈、小辈聊天，讲得最多、听得最多的还是抗战英雄故事，同村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盘山村蒋氏宗祠旁，一块高约2.5米、长约20米的大理石浮雕像静静矗立。2013年，盘山村将蒋志英在内的12位抗战英雄像雕刻下来，希望把英雄保家卫国的精神传递给更多后人，让年轻一代常怀感恩、立志报国。

村里的“00后”蒋晨楠一直有个“军人梦”，读大学二年级的他去年成功入伍：“受前辈英雄精神感召，我们村的年轻人每年都踊跃参军。我将用实际行动传承好英雄精神。”

(新华社杭州电)

徐悲鸿爱画入骨髓

世人多闻爱财如命者，而徐悲鸿则自称“爱画入骨髓”。他的爱画与众不同：既珍视己作，更由衷欣赏他人佳品；非一时兴起，而是生挚爱；甚至不惜以命相护，将爱画之情真正刻入骨髓。

一次评阅学生作业，徐悲鸿被文场所绘的一幅野山兔静物深深吸引。他反复驻足凝视，目光流连难舍。最终，他郑重提出愿以自己的两幅画作交换。

抗战时期在重庆，一天深夜风雨大作，吹落墙上悬挂的学生旧作《雁荡山》。画作不幸磕碰桌角，顿显裂痕。徐悲鸿闻声而起，衣衫未整便急切捧起画作。翌日清晨，他不假他人之手，精心修补裂痕，视之如同疗愈生命。后来在昆明举办画展时，徐悲鸿痛失至宝《八十七神仙卷》，为此寝食难安，一心想要寻回。一个叫刘汉钧的人主动请缨协助寻画。几经周折，徐悲鸿付出20万元巨款，方“寻回”此画。当得知刘汉钧很可能就是窃画者时，徐悲鸿不仅未加追究，反而坦言：“无论如何，即使画确为他所窃，他能使其完好归还，我依然万分感激。”

徐悲鸿常去北平琉璃厂寻觅古旧字画。店铺深邃，需穿过几重院落。他每于入口处远望堂中佳作，便按捺不住心中喜爱，快步向前，口中连连道：“此画甚好，我要了！”店主见他情切，趁机抬价。亲友屡次劝他须沉得住气，佯作淡然以利议价。他虽然口头应承，但下次遇到心仪之作，依然真情流露。

正是这份赤诚与对艺术的执着，让他不惜代价，最终将《风雨归舟》《折槛图》《八十七神仙卷》等国宝级画作纳入珍藏，如今尽藏于徐悲鸿纪念馆，泽被后世。(据《人民政协报》)

源远流长说熨斗



海南民俗博物馆馆藏的铜熨斗。

美，今人仍可从中窥探辛追夫人当年的容光，毕竟她所处的西汉，熨斗早已广泛使用。

从商周、战国、汉朝宫廷走出的青铜熨斗，其纹饰同样比照青铜礼器纹饰制造，即使民间铸造也一以贯之。

儒钟村熨斗用于装木柄的吞口为瑞兽麒麟，即獬豸，湖南张家界实力派鉴赏者杨年华君认为：器身铸两组相对四只鸂鶒纹(猫头鹰)商代它象征战场上的胜利与强大战斗力，其最早的图腾意义可追溯到商代宗庙重器上主体纹饰，承载神圣意义。

鸂鶒纹鸟尾处“人”“人”字形纹饰似为方折雷纹的纵向压缩变体。商周青铜器上的标准雷纹多作回旋方折状，而战国工匠为适应小型器物表面，将原本横向延展的雷纹单元垂直压缩，形成类似“人”字的锐角结构，鸟、“人”字纹，可构成“鸟喙啄雷”的意象组合，隐喻神鸟掌控自然。

儒钟村熨斗器口除翻沿滚边装饰、加固外，器身正中凸起卷云纹装饰，加固斗(勺)身后部承重及柄部前沿延伸高起，以遮挡炭火的灼热。卷

云弯钩状突起在青铜器术语中通常被称为“扉棱”，其形制、纹饰风格及锈蚀程度可认定为清中期作品。

2024年9月，海南民俗博物馆新馆开馆，儒钟熨斗因家世显赫得享专柜专柜隆重展示。

此外，海南民俗博物馆还馆藏其他几柄铜熨斗：一只板底径宽9.5厘米，器身万字符“卍”纹锦地开窗装饰五朵太阳花蕊盛开；一只板底10.8厘米，器身“回”纹锦地装饰三组倭角正方框中铸夔龙纹(一说为分解式饕餮纹)，其特别处在于吞口铸为麒麟还再捏塑装饰独角(早期麒麟为独角)和双耳等，笔者在海南仅见孤例，它俩年份约为清晚期；更晚至民国的另有板底宽14.2厘米，器身、把处光素无纹饰的熨斗，可能是城镇裁缝铺、成衣店工具；一只底板10.6厘米熨斗，用锤揲工艺加工，器身与把用铆钉连接，周身光素无纹。

及至近现代，一种生铁铸造、状若青瓷虎子、后下开小炉门、前上留烟囱的船形熨斗问世，因其造型简单，材质便宜，得到普及。19世纪末，美国发明电熨斗，百年后铜熨斗销声匿迹，生铁熨斗也消失不见。

(据《海南日报》)

文人逸事

范长江访延安

1937年2月，身为《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为了采访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真相，只身冒险去西安。通过杨虎城将军，范长江见到了为和平解决“双十二事变”来到西安的周恩来同志，详细了解前因后果，并首先公开报道了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

在西安，经周恩来介绍，范长江又会见了叶剑英。从周恩来、叶剑英身上，范长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为民族的真正的革命政党，于是他决定去延安采访。

2月6日，范长江从西安搭乘载重汽车，于2月9日顺利到达延安。当天晚上，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举行了欢迎范长江的宴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人参加了宴会，席间，他们同范长江进行了热情坦诚的交谈。宴会散时，已是深夜10时，毛泽东同志又在自己住的窑洞中同范长江作了彻夜长谈，两人谈话融洽，竟然不知东方之既白。通过这些接触，范长江对延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2月10日，范长江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离开延安。接着他在《大公报》发表了《陕北之行》，这篇新闻通讯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以极大的热情第一次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蓬勃的面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人物，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后来，他写的《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等通讯也都真实、热情地报道了陕北边区的情况。

通过这次延安之行，范长江也由一个正直爱国的新闻记者，最终转变成为一名自觉投身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范长江在党，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联谊报》)

丰子恺遇恩师

12岁那年，丰子恺上小学读书。当时，他已经描了好几年的色彩画，有一定的绘画基础。不过，那些画好的作品他却很少示人，只是小心地收藏着。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遇到了堪称影响其一生的恩师李叔同。当时，李叔同在校担任音乐和绘画教师，丰子恺便跟着他学绘画。

在李叔同的悉心教导下，本来就有绘画基础的丰子恺很快便展露出天赋，绘画水平提高很快，李叔同对丰子恺也是格外照顾。加上丰子恺聪明懂事、成绩优秀，李叔同便委以他年级长的重任，丰子恺内心高兴不已，立即爽快地答应下来。

有一天晚上，丰子恺大着胆子，带着自己几天来在西湖边画的素描找到李叔同，拘谨地开口道，希望老师能为自己的画作提出宝贵意见。李叔同接过画作一看，大吃一惊。虽然他早已知道这个学生喜欢画画，却没有想到他画得如此之好。最重要的是，对方只跟随自己学习了不到一学期的绘画。

李叔同一边赞叹，一边发自内心的对丰子恺说：“我带过很多学生，从来都没有像你这样进步如此神速的。如果你愿意，今后可以单独跟我学画。”

听了老师的话后，丰子恺惊喜万分，这比上次老师委任自己当年级长更令他开心，当即答应。从那之后，被幸运之神眷顾的丰子恺便成为了李叔同的“关门弟子”，这也让许多同学羡慕不已。

(据《联谊报》)

古代文人的“稿费”

稿费是创作者通过文字作品获取报酬的常见方式，而这一概念，在古代便已萌芽，古人称之为“润笔”。古代文人凭借才华与笔墨，在纸卷上挥毫泼墨，收获的不仅是文名，还有丰厚的物质回报。许多润笔故事成为了古代文化史上的独特篇章，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文学地位与文人境遇。

司马相如堪称汉代文学明星，他以一篇《长门赋》惊艳世人，也创造了令人咋舌的润笔传奇。相传陈皇后阿娇失宠于汉武帝后，独居长门宫，愁闷悲思。为了重获帝王欢心，她听闻司马相如文才出众，便命人奉上百斤铜，恳请他为自己写一篇赋以打动汉武帝。司马相如妙笔生花，仅用600字便将陈皇后的哀怨、孤寂与期盼描绘得淋漓尽致。百斤铜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不仅彰显了司马相如的文学价值，也反映出汉代贵族阶层对文学的重视，以及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重金的行事风格。司马相如的润笔之资，成为了文人以笔取酬的典范，也为后世文人展现了文字背后蕴藏的巨大价值。

到了唐代，文学发展达到鼎盛，润笔之风更为盛行，杜牧、韩愈、皇甫湜、白居易等文坛巨匠，也在润笔之事上留下了诸多佳话。杜牧以其俊朗洒脱的文风闻名于世，他曾因一篇500字的文章，收获300匹绢的润笔。绢在唐代是重要的流通货币与贵重物资，300匹绢的价值极高，足以支撑一个普通家庭多年的生活开销。杜牧的巨额润笔，堪称古代润笔史上的奇迹，这不仅凸显了皇甫湜在文学创作上的独特价值，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代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有能力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来获取优质的文学作品。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地位崇高，其润笔收入同样可观。他曾为他人撰写1500字的文章，得到500匹绢的回报。韩愈的文章气势磅礴，说理透彻，不仅在文学上有极高造诣，还承载着他的思想与主张。他的润笔经历，反映出当时文人的社会影响力。一些权贵、富商乃至地方官员，都希望借助韩愈的文笔为自己或家族增添光彩，愿意支付丰厚报酬。这也表明，在唐代，文学不仅仅是精神财富，更是能够带来实际利益的重要资源。

与韩愈同时代的皇甫湜，虽名气稍逊，但润笔之资却令人瞠目结舌。他曾撰写3000字的文章，获赠1.8万匹绢。皇甫湜性格孤傲，文风奇崛，以独特的文学风格吸引了众多求文者。1.8万匹绢的巨额润笔，堪称古代润笔史上的奇迹，这不仅凸显了皇甫湜在文学创作上的独特价值，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代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有能力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来获取优质的文学作品。

白居易作为唐代诗坛的一颗巨星，其作品通俗易懂，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也深受上层社会喜爱。他撰写1400字的文章，获得70万铜钱的润笔。白居易一生创作颇丰，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70万铜钱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这说明白居易的文学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领域，成为了社会各阶层都追捧的文化符号。他的润笔故事，展现了文人在唐代社会中较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

刘知几《史通》有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这“大”不仅在于载道传世，更显现可在可称量的价值维度。从司马相如的铜山到白居易的钱山，文字以惊人的变现力，在历史长卷上烙下“文能生金”的烫金印记。(据《山西晚报》)